

上海經濟：停滯與再起飛 (1953-1993)

• 高汝熹 郁義鴻

一 上海經濟發展的 三個時期

從1953年至1993年的四十一年間，上海經濟增長可以分為三個階段。1953至1978年的二十六年為第一段，年均增長8.8%，它明顯地高於全國平均水平。1979至1990年的十二年為第二階段，年均增長7.5%，它低於全國平均水平。到1992年，上海經濟增長速度才開始超過全國平均水平（雖然1991年上海國民收入增長率已高於全國0.1%，但我國的國民收入僅包含物質生產部門，不夠全面）。因此，將1992年作為新階段的開始是合理的。

這三個階段十分典型地反映了上海近四十一年來發展的歷程：第一階段為傳統體制內的成長，第二階段是相對停滯的時期，1992年開始的第三階段則意味着上海再次起飛。由於上海經濟體制在全國有相當的代表性（從圖1中可見，上海經濟波動和全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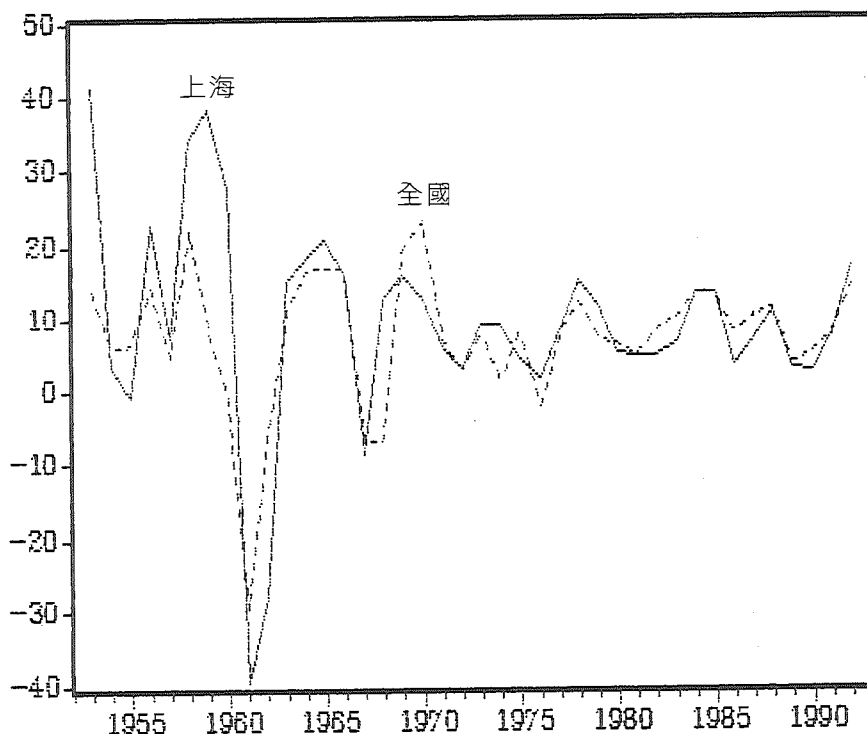
經濟波動是完全同步的），分析這三個階段經濟發展的內在因素，對我們瞭解計劃經濟的轉型是有啟發性的。

我們先來看看這三個時期中分別有那些為經濟增長作出貢獻的因素，從中可以發現其推動力是大不相同的，它十分清楚地表明那些是制約經濟增長的基本因素。第一個值得重視的差別為技術。我們可將上海經濟的增長分解為勞動力投入的貢獻、資本投入的貢獻及技術進步作用三大因素。根據高汝熹、顧國章對上海工業增長的分析，和郁義鴻對上海第三產業增長的分析，可得有關結果如表1所示^①。可以看到，第一階段，上海工業投入少而產出多，技術進步作用明顯，而第二階段則恰恰相反，上海工業增長依賴於高強度的投入，技術進步作用甚弱。

第二個差別為資金來源構成的變化。在傳統體制下，資金來源單一，政府是唯一投資主體，計劃部門是投資項目的主要決策者。自改革開放

上海經濟增長可以分為三個階段，1953至1978年的第一階段為傳統體制內的成長。1979至1990年為第二階段的相對停滯時期。到1992年的第三階段為上海經濟再次起飛。

圖1 上海與全國國民收入波動的比較



始，投資主體逐漸多元化，企業融資渠道及方式亦呈多樣化趨勢。這無疑是後一階段上海經濟增長模式的一大重要特徵。特別是，照表2所示，90年代始，上海經濟發展的一個重大變化是外資投入的大幅度上升。若按協議吸收外商投資額計算，到1990年底累計為28.82億美元，1991年僅為3.75億美元，而1992年則達33.57億美元，超過前十三年總和，1993年再上台階，達70.16億美元，再超過前十四年之總和。

第三個因素為不同經濟類型企業的貢獻差別。因數據限制，我們僅對

工業作分析。很明顯，一個基本趨勢是非國有企業^②，特別是「三資」企業對上海工業增長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按不變價格計算，1978年，國有企業與集體企業在上海工業總產值中分別佔91.2%與8.8%，其他經濟類型企業為空白；到1992年，三者比重變化為55.2%、19.3%與25.5%，而其他經濟類型中的「三資」企業產值已佔11.3%。1993年，按工業銷售產值計算，國有工業僅增長2.3%，集體經濟工業增長31.6%，而其他經濟類型工業增長高達51.9%。

再按不同類型企業對工業總產值

表1 上海經濟增長的要素貢獻與技術進步作用 (單位：%)

產業	年份	資本投入貢獻	勞動力投入貢獻	技術進步作用
工業	1952-1978	18.0	32.0	54.0
	1978-1988	32.8	47.9	19.3
第三產業	1981-1991	20.8	37.0	42.2

表2 上海實際利用外資情況 (單位: 萬美元)

年份	總計	對外借款	外商直接投資	外商其他投資
至1990年底累計	447,284	299,399	138,061	9,824
1991	86,595	68,260	17,527	808
1992	176,892	66,239	78,996	31,657
1993*	—	51,100	278,616	—

* 據上海市統計局1993年統計公報估算。

資料來源:《上海統計年鑒》。

表3 各種經濟類型企業對工業總產值增長的貢獻

年份	工業總產值 增量(億元)	國有工業企業		集體工業企業		其他經濟類型工業企業	
		工業總產值 增量(億元)	貢獻 (%)	工業總產值 增量(億元)	貢獻 (%)	工業總產值 增量(億元)	貢獻 (%)
1953-78	482.92	484.23	100.3	48.36	10.0	-49.67	-10.3
1979-90	1,180.05	691.20	58.6	247.67	21.0	241.18	20.4
1991	243.98	81.27	33.3	65.65	26.9	97.16	39.8
1992	399.05	36.66	9.2	95.83	24.0	266.55	66.8

資料來源: 根據《上海統計年鑒》數據計算。本表按當年不變價格計算。

增長的貢獻, 這一趨勢更為明顯。如表3所示, 其他經濟類型工業企業的貢獻在1953至1978年階段為-10.3%, 在1979至1990年為20.4%, 而1991與1992年急劇上升至39.8%與66.8%。

這三個因素的比較使我們看到, 第二階段上海經濟的發展落後於全國甚至停滯, 其重要原因是原有的計劃體制已構成嚴重束縛, 而1978年後, 特別是1992年後增長的基本動力均來

自市場、機制、外資以及種種新的因素。實際上在這些數據的背後, 我們看到的是上海經濟所處的環境發生了基本的改變。

上海經濟面向本市、國內及國際三大市場, 從上海國民收入使用額的增量分析中可以發現(見表4), 從1953年至1978年, 國民收入淨流出的增量在國民收入全部增量中佔69%, 而在第二階段, 此比例竟為負值。它

表4 上海國民收入增量的需求因素 (單位: 億元, %)

年份	國民收入增量	流出淨額 增量	所佔 比重	本市使用			
				積累增量	所佔 比重	消費增量	所佔 比重
1953-1978	212.06	146.35	69.0	31.28	14.8	34.43	16.2
1979-1990	371.71	-47.75	-12.9	195.71	52.7	223.75	60.2
1991	79.69	20.59	25.8	1.40	1.8	57.70	72.4
1992	184.09	5.08	2.8	118.61	64.4	60.40	32.8

資料來源: 根據《上海統計年鑒》數據計算。

表5 上海對外貿易額佔全國比重 (單位: %)

年份	進口額 佔全國比重	出口額 佔全國比重	進出口總額 佔全國比重	海關進出口總額 佔全國比重
1952	—	14.5	—	—
1978	1.2	29.7	14.7	—
1990	4.0	8.6	6.4	15.0
1992	3.6	7.7	5.9	15.0
1993	4.0	8.0	6.5	15.2

資料來源：《上海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年鑒》。

表明前一階段上海經濟需求還來自國內、國際兩大市場，後一階段則演變為本市的消費與積累共同作用的模式。顯然，80年代中國其他沿海省份的崛起，上海在國內市場中地位的不斷下降是其最直接成因。此外，上海產品的出口在前一階段增加了27.74億美元，從1979年至1990年則增加了24.24億美元，前一階段平均增長13.1%，後一階段平均增長僅5.2%，對國民收入增長的貢獻作用亦呈下降趨勢。

這表明本作為中國經濟中心城市的上海，其面向國內市場的開放度在逐年下降。以國內市場貿易總額(即國內純購進+市外調入+國內純銷售+調往市外)與GNP的比值作為衡量指標，上海1978年為143.21%，到1989年達到194.14%，1990年降至177.93%，1992年再跌至144.15%，三年中下降50%。雖然該指標所反映的只包括各種經濟類型的商業企業的國內貿易總額，而非商業性企業所經營的商品流通在近年中有增長的趨勢，但畢竟反映出上海對國內市場開放度的降低。

同樣的趨勢也反映在出口之中，上海產品的出口曾經在1978年即達到佔全國29.7%的比重，然而80年代沿海省份的後來居上使上海產品在出口

中地位驟降。90年代的新增長亦未扭轉頹勢，雖然1993年上海出口增速高於全國平均水平，其比重卻仍未達到1990年水平，按進出口總額衡量亦是類似(見表5)。

由表5可見，作為中國最大港口的上海，其海關進出口額佔全國比重卻在80年代明顯下降，90年代的新增長亦未對此產生顯著影響。結果以海關進出口減去上海本市進出口額作為上海的內外轉口額，則其佔全國比重在1993年反而略有降低。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上海的國內貿易額佔全國比重近幾年亦呈下降趨勢(見表6)。雖然上海的社會商品零售總額佔全國比重有所上升，且在1993年上升較多，但其主要因素恐怕在於由上海本市居民收入上升快於全

表6 上海國內貿易額佔全國比重 (單位: %)

年份	社會商品零售總數 佔全國比重	(國內純購進+國內 純銷售)佔全國比重
1952	7.1	—
1978	3.9	—
1989	4.4	6.60
1990	4.3	6.29
1991	4.3	6.27
1992	4.5	5.70
1993	5.3	—

資料來源：《上海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年鑒》。

國平均水平所帶來的本市消費的增長。

總之，我們看到，上海經濟發展在這三個階段中的變化顯示出一個明顯的趨勢，這就是上海經濟發展的推動力和市場拉力越來越地方化，越來越取決於上海自身了。

第二階段上海的再起飛，推動力也主要來自上海自身，1992年對國民收入增量起主導作用的是上海本市的積累增量，所佔比重高達64.4%。1993年的相應數據雖不可得，但從上海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數額的急劇增加來看，這一特徵應與1992年同。事實上，從1991至1993年這三年中，上海投資總額分別為258.30億元、357.38億元和624.95億元，後兩年的增長率分別達38.4%與74.9%。

二 上海產業結構變動分析

上海經濟發展的三個階段中，我

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明顯的趨勢，就是上海經濟發展的推動力和市場拉力越來越地方化，越來越取決於上海自身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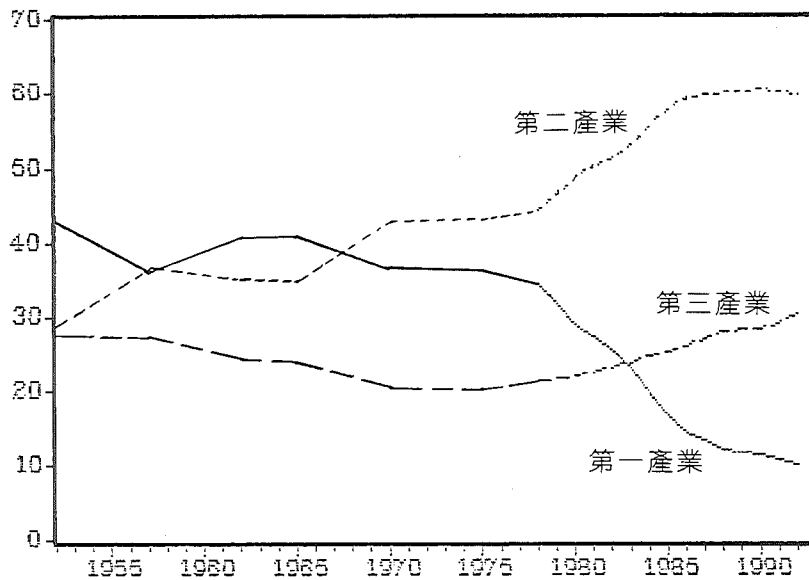
們可以明顯看到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是不同的。第二產業增加值在GNP中的比重從1952年的52.4%上升至1978年的最高值77.4%，即轉而下降至1992年的63.6%；相應地，第三產業增加值比重則從41.7%降至18.6%，轉而上升至33.2%。1993年，第二產業比重再降為59.8%，第三產業則升至37.9%。在第三產業比重的上升中，物價的上漲是一重要因素。若按指數計算，上海1992年GNP為1978年的2.92倍，第二產業與第三產業則分別為2.73倍與4.00倍，按1978年當年價格計算的GNP為796.61億元，第二產業與第三產業增加值分別為576.17億元與203.04億元。因此，第二產業與第三產業比重分別72.3%與25.5%。扣除物價因素，從1978至1992年，第二產業比重僅降低5.1%，第三產業比重僅上升6.9%，其餘7.7%均由第三產業物價指數高於第二產業所造成。第三產業物價指數高於第二產業，一方面由「貨幣化」造成，如住房商品化、教育產業化等；另一方面則屬相對價格的變動。在後一階段中，服務價格的上升快於工業產品價格的上升。

這裏我們看到，標誌着經濟發展三個階段的，是產業結構變動。它有兩個明顯的特點，第一個特點為1978年是一個重要轉折點。1952至1978年間，第一產業與第三產業就業比重平緩下降，第二產業就業比重平緩上升。1978年後，第一產業就業比重急劇下降，第二產業比重急劇上升（1985年後趨於平緩），而第三產業就業比重由下降轉為上升（見圖2）。

儘管已呈現第三產業比重上升的趨勢，但正如我們在前面所敘述的，其上升速度遲緩，與紐約、東京、香



圖2 上海三次產業就業結構的變動



港、新加坡等現代國際大都市差距甚遠，即使在90年代的新增長勢頭中仍未有明顯突破。產業結構轉化中最大的困難是第二產業，主要是國有工業企業中有大量冗員，但考慮到社會穩定因素而不能直接交由勞動力市場去解決，而80年代以來政府未能採取有效措施(如再就業培訓等)促使就業結構轉變，以致這一問題似乎已成為上海產業結構轉變中的最大難點。不僅如此，就業結構轉變的滯後亦直接影響產生結構轉變的進程。

產業結構變化的第二個特徵是：重工業幾起幾落，最近再次成為上海工業增長的主導產業。上海工業中輕重工業的比重變化較大，但事實上重工業的發展始終放在首位，只是在經濟困難時期與經濟調整時期，才注意發展輕工業，降低重工業的發展速度，而一旦情況好轉，又回過頭來加快重工業的發展。輕工業始終未被置於應有的地位，全國如此，上海亦如此。在上海的國民生產總值中，工業增加值比重1952年為49.7%，1978年達76.1% (最高值為1970年的

76.5%)，1990年降至60%，1992年仍達59.7%。而在工業總產值中，重工業比重從1952年的20.9%，上升至1978年的50.7%，到1990年降至48.2%，但近幾年又復回升，1991年為49.4%，1992年達到52.1%。以此估計，上海重工業的增加值在GNP中約佔30%左右，可見其重要性。

必須指出，「重重、輕輕」作為上海經濟增長模式的一大主要特徵，如果說在1978年之前，當「工業城市」作為上海戰略目標時尚情有可原，那末在1978年之後，特別是在明確上海發展的戰略目標轉變為現代化、多功能的經濟中心城市，以及進一步上升為國際經濟、貿易、金融中心的情況下，這種一以貫之的「重重、輕輕」實有大可爭議之處。關鍵是，除了勞動力投入基本相當外，資金與稀缺資源的投入和消耗，重工業大多在輕工業的兩倍以上，特別是作為大城市最珍貴的土地資源，重工業的佔用也超過輕工業一倍以上，但以總產值、淨產值、銷售收入、利稅等衡量，重工業的雙倍投入僅能換取與輕工業幾乎等

上海始終把重工業放在首位，只有在經濟困難時期與經濟調整時期，才注意發展輕工業，而一旦情況好轉，又回過頭來加快重工業的發展。

量的收益，且輕工業的出口總額大大高於重工業。

三 上海的城市現代化

與上海經濟近乎停滯相應，上海的城市現代化也長期停滯不前，特別是在我們所講的第二階段，和全國尤其廣東形成了巨大的落差。

改革開放前，城市建設並非上海地方政府的重要議事項目。事實上，當時也沒有財力來實行城市的改造。1978年之後，上海擔任「改革後衛」的角色，財政上交負擔沉重，只是在1984年上海發展的戰略目標有所修正之後，城市基礎設施的投資才有了較明顯的增長（1984年為9.77億元，1985年上升至23.17億元）。但面對數十年未有足夠投入，欠帳纍纍、面目陳舊的上海城，這些投資額無異於杯水車薪。

1990年浦東開發開放的宣布，使上海大規模的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拉開了序幕。浦東新區十大基礎設施工程建設可謂第一戰役。其後，上海基礎設施建設及與此相伴隨的舊城區改造

逐漸向浦西全面推進，特別是1992與1993兩年達到新的高潮。由表7數據可見，90年代城市基礎投資在總投資中的比重大幅上升且逐年提高。另一重要變化是道路交通等市政建設投資，佔城市基礎設施總投資的比重在1992年大幅提高到35.0%，比上年上升了13.8%。

特別要強調的是，土地批租使上海的資金籌集與舊城區改造走出了新路。可以說，沒有土地批租，上海90年代的大規模城市建設是不可想像的。舊體制下的舊觀念使土地批租根本不可能實現，甚至不可能成為人們頭腦中的構想。即使改革開放之後，土地批租的可行性在理論與實踐兩方面均障礙重重，以致直到1988年，即改革開放十年之後，上海才出現了第一塊土地使用權的出讓（虹橋開發區第26地塊）。從1988至1991年四年中，上海全市僅批租地塊十三幅，步伐緩慢。自1992年始，上海的土地批租出現新的飛躍。如表8所示，1993與1992年相比，批租地塊數增加了五十塊，而地塊面積則增加一倍多。此外，浦東的批租地塊數雖少於浦西，但地塊面積卻大大高於浦西。浦東新

改革開放之後，土地批租的可行性在理論與實踐兩方面均障礙重重，以致直到1988年，上海才出現了第一塊土地使用權的出讓。

表7 上海城市基礎設施投資比重與構成（單位：億元，%）

年份	全民和城鎮 集體單位投資	城市基礎 設施投資	其 中				
			電力建設	交通運輸	郵電	公用事業	市政建設
1979-1990	1,295.36	243.76 (18.8)	75.43 (30.9)	58.74 (24.1)	18.15 (7.4)	45.42 (18.6)	46.00 (18.9)
1991	219.81	61.38 (27.9)	19.79 (32.2)	14.49 (23.6)	4.58 (7.5)	9.15 (14.9)	13.37 (21.8)
1992	284.42	84.35 (29.7)	19.70 (23.4)	15.01 (17.8)	6.43 (7.6)	13.65 (16.2)	29.56 (35.0)
1993	—	164.19	—	—	—	—	—

資料來源：《1992年上海經濟發展報告》、《1993年統計公報》。

註：「城市基礎設施投資」欄中括號內數字為其佔「全民和城鎮集體單位投資」比重，「其中」各欄中括號內數字為其佔「城市基礎設施投資」比重。

表8 上海土地批租情況

	1992年			1993年		
	合計	浦東	浦西	合計	浦東	浦西
出讓地塊數(塊)	201	29	172	251	65	186
地塊面積(萬平方米)	2,060	1,518	542	4,968	4,610	358
可建面積(萬平方米)	894	98*	796	782	—	—

* 不計成片開發。

資料來源：《1992年上海經濟發展報告》、《上海統計手冊1993》。

區作為上海發展的新增長點，在土地批租方面有突出表現。今年以來，上海全市又出讓地塊九十四幅，共出讓面積495萬平方米，仍保持較強勢頭③。

土地批租成為上海資金籌集，特別是城市建設資金籌集的重要渠道。1992年，上海從土地批租共獲出讓金26.7億美元及15.3億人民幣，其中外資投入達19.25億美元。若以1美元兌換7.5元人民幣計算，上海1992年的土地批租共獲出讓金約215億元人民幣，佔當年上海全社會固定投資總額357.38億元的60%。

因此，從宏觀上講，上海城市的現代化起步是第三階段即1992年以後的事。至今，它剛起步，遺留問題極多，上海城市環境未有明顯改善，某些方面甚至在繼續惡化。城市交通擁擠是上海多少年來最突出的矛盾之一，雖然上海實有道路長度已從1978年的905公里增加到1993年的2,722公里，道路面積也已從868萬平方米增加到2,829萬平方米，但仍不能緩解這一矛盾。儘管近幾年在市政建設上投入大量資金，且已有一批道路工程竣工，如外灘綜合改造一期、二期工程、吳淞路閘橋、江蘇路拓寬等，但隨着經濟發展速度的加快，交通運輸的需求亦急劇上升。上海公交營運車輛已從1978年的2,983輛增加到1992

年的6,837輛，1993年再增至7,037輛。營運出租車更以驚人的速度增加，1992年末為1.8萬輛，到1993年末已達3.1萬輛，一年之中增加1.3萬輛，增速達72%。上海的流動人口已達日均300萬左右。上海正在進行的大規模城市建設，如內環線、成都路高架等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這一矛盾。可以預計，內環線與成都路高架的完工將較大幅度地緩解上海交通擁擠的矛盾，但隨上海經濟的高速增長，這種樂觀的前景很可能並不能保持多少年。

環境污染問題是上海城市現代化的又一重大問題。水質污染是上海分布最廣、最嚴重的污染，雖然合流污水工程主體已投入使用，但僅能解決蘇州河污染問題，且其見效尚待時日，而黃浦江已達一年288天的黑臭期，川楊河水質平均為4-5級，其他11條主要河流中的7條水質也為5級。此外，大氣污染、噪聲污染、垃圾污染等問題亦相當嚴重。

上海的生態環境污染主要源於工業污染。1991年上海工業廢水、廢氣、固廢排放量分別達到13.25億噸、4,000億標立方米與1,090萬噸，發生污染事故36起，四項指標均高踞全國各大城市之首。1992年上海工業廢水排放等再增加到13.70億噸，廢氣4,418億標立方米，固廢13.0萬噸。

上海城市的現代化，遺留問題極多：交通擁擠、環境污染、公共綠地受到侵害等等，這些問題實不容忽視！

90年代上海經濟得以再起飛，實由於其經濟運行機制的變化所致。



上海公共綠地面積1978年僅384公頃，1992年增加至1,121公頃，但人均綠地面積仍遠低於國外大城市，低於聯合國規定的城市人均綠地標準50-60平方米，也低於我國標準7-11平方米。1993年，上海人均綠地面積由上年的1.10平方米增加到1.15平方米，但與此同時，市中心140平方公里範圍內的公共綠地卻減少了30多公頃。上海的綠色實在「貧困」，上海的「綠肺」在繼續受到侵害。此外，上海的交通事故、火災等人為災害亦在上升，環境問題不容忽視！

四 結 論

縱觀上海經濟發展三階段，我們可以看到由於這三階段背後運行的經濟機制不同，才使其發展後果呈現出巨大差別。第一階段推動上海經濟的是傳統計劃體制。傳統體制乃行政體制，作為其運行基礎的計劃體制對社會資源的配置發揮基本的決定作用，但在某些關鍵點卻受行政長官意志的

左右，從而加劇了經濟的波動。如「大躍進」、「大三線、小三線」建設等莫不如此。作為全國工業中心城市的上海首當其衝，一方面作為全國經濟的支柱備受推崇，另一方面卻因成為中央財政主要來源而受緊密控制。由此，傳統體制下「重生產、輕消費、重生產、輕流通，重重工業、輕輕工業」等特點在上海經濟運行中無不表現得淋漓盡致，並使上海的重工業及總體經濟產生比全國幅度更大的波動。輕紡工業因消費的備受遏制而不能充分發育，雖上海貨在全國各地是「皇帝女兒不愁嫁」，但輕紡工業始終不能成為上海經濟的主導產業。上海經濟呈現明顯的計劃導向、投資需求拉動、輕重工業關聯度小，重工業自我服務、自我膨脹，積累率高但大部上繳等特點。

第二階段是全國改革開放，像廣東那樣的地區走得特別快，而上海卻作為計劃經濟的大本營，充當着改革的後衛。雖然從1978至1990年，在改革開放的強大推動力下，上海經濟運行的體制有了最根本的變化，即由計

劃導向轉為市場導向，但由於上海經濟中，國有大中型企業比例過高，改革滯後，開放不足，以及仍然受到中央較嚴格控制，財政上繳負擔較重等原因，致使上海經濟運行的其他特點並未有重大變化。特別是由於沿海開放省份的紛紛崛起，在「計劃保護傘」層層撤消，上海經濟、上海企業自身又缺乏活力的情況下，上海產品在國內市場上節節敗退，使得上海的輕紡工業雖仍有所發展，但其水平遠遠落後於其他沿海開放省市。

第三階段為上海經濟的再起飛，也就是90年代的新發展。但是正如我們前面所論述的，上海在近二十年來經濟推動力已日益地方化，而且為國營企業佔多數這一巨大包袱所限，它造成一個很重要的結果，這就是90年代的上海經濟新發展在運行機制上所產生的重大變化由土地批租所引發。

數十年未變的上海舊城區顯然與上海發展的戰略目標格格不入，且成為上海城市現代化建設的最大障礙。土地批租使上海舊城區改造創出新路，不僅解決了舊城區改造本身所需資金，而且使上海大規模的市政道路建設有了財力支撐。

雖然上海的基礎設施建設始於80年代末，但只有大規模的土地批租才使基礎設施建設有可能大規模推進，而由此產生的固定資產投資額的成倍增長又對上海經濟形成巨大的投資需求拉動。不僅如此，由於上海目前的投資總額中有約40%轉化成消費需求，從而又形成一定的消費需求拉動。

值得注意的是，土地批租的勢頭似乎成為上海90年代新發展的良性循環機制的關鍵一環，而土地批租的勢頭能否持續，也就對今後相當時期內

上海的持續發展具有重大影響。但上海的舊城改造畢竟有其止境，特別是，外資、外商及內資、內商對上海土地及房地產的熱望及需求最終導源於上海經濟的聚集力、擴散力及與此相應的巨大商業機會。上海究竟如何創造更多的商業機會，如何提高上海的對外開放度，對國內的開放度，如何迅速強化上海的聚集力與輻射力，這些不能不是上海為尋求長期持續發展，為實現戰略目標所必須加以解決的首要問題。

註釋

① 參見鄭紹濂主編：《上海工業結構調整戰略》（同濟大學出版社，1992）與郁義鴻：《上海第三產業技術進步實證研究》（研究報告）。

② 本文中「國有企業」指「完全國有」的企業，即全部資本均為國有的企業，除此之外的企業統稱為非國有企業。

③ 《解放日報》，1994年6月26日。

高汝熹 1964年復旦大學數學系畢業。1984至1994年任復旦大學管理學院副教授、教授、博士導師。曾獲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和其他多項科技獎。著作有《數理經濟學》、《上海工業結構調整戰略》等20餘冊。

郁義鴻 1982年復旦大學數學系畢業。1984年獲復旦大學管理科學系碩士學位，現任該系副教授。曾獲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和上海科技進步二等獎。著作有《新世紀 新浦東》等。